Co-China 周刊

NO. 186
2015年01月05日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魏斐德:皇太极的汉族合作者(节选自《洪业》)|

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杨奎松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沈志华

黑水白山

东北与近代中国的形成



编者的话

在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中，东北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深山老林里，凶悍的熊罴虎豹在等待过往行人；绝顶险峰上，残暴的土匪强盗在守卫金银财宝；狂风暴雪中，一支解放军的小分队却以建立新社会为目标，悄然向危险靠近。

在真实的历史中，威虎山下的林海雪原也并不寂寞。从清军入关到日本侵华再到国共内战，东北都扮演了“兵家必争之地”的角色。这三段历史的转折究竟如何在东北的土地上展开?它们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 今天的中国又带着哪些它们的痕迹? 本期周刊聚焦于素有“白山黑水”之名的东北，因为历史向今天投下的斑驳疏影，绝非黑白两色所能表达。

1644 年，明朝在起义军和清军的内外压迫下崩溃了。虽然后来问鼎中原者是来自关外的满人，但明清交替并不能由简单的“某一民族征服另一民族”解释。东北素来是汉人与其他族群杂居之地。在明朝文武大臣投靠清廷之前，辽东固有的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就为清政权输送了大量的劳力、军力乃至脑力，对清朝的崛起功不可没。不过，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大清国就开始在西方的威胁下尽显老态。清廷方方面面的积弊激起了几代人的改良乃至革命热情，为后来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沃土。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群雄并起的军阀混战时期。面对在内地缠斗不休的各派人马，关外东北军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时局。然而，九一八事变拆散了东北军的框架。撤入内地的东北军即使建制完整，也不过是一支没有根基和自我补充能力的队伍。也就是在背井离乡和国耻家仇的绝望之下，张学良开始与红军联络，最终酿成了改变抗战乃至国共未来的西安事变。

在关注九一八事变和抗战的同时，历史学家也提醒我们勿忘发生在 1905 年的日俄战争。虽然当代的中国与俄国关系密切，但沙皇俄国和苏联对东北的垂涎却不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下。

抗战结束不久，苏联对东北的企图便再次显露。为了争取在东北的利益并维护与美国缔造的战后和平，斯大林在支持中共夺取东北和坐视美蒋接收东北之间反复权衡。莫斯科、华盛顿和南京之间的勾心斗角，终于促使斯大林为中共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正因如此，国共双方的实力差距大大缩小。即使枪炮并非分出胜负的唯一因素，这批装备对战争走势的影响也是无可回避的；而这场内战的结果，无疑影响了今天的你我生活在怎样的中国。

回顾历史，东北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数次重大转折。这是戏剧性的机缘巧合，还是无形的宿命？



目录

【掠影】

白先勇：东北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及复杂多变的历史传统（节选自《父亲的憾恨》）



白先勇，台湾旅美作家。出生于广西省桂林临桂县，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父亲白崇禧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

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东北亦是中国的火药库，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战争、革命都是在东北引爆的。

”

编者的话:东北曾是古代北方游牧文明南下的起点，也是近代日俄势力垂涎的目标，更是内战时国共的必争之地。正如文学家白先勇所说，“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战争、革命都是在东北引爆的。”本文节选自白先勇先生对四平战役的分析，一览东北在中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南起旅顺大连，北至漠河，东起混同江，西至贝而斯池，约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之广大土地。东北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举凡煤、铁、金沙、银矿、镁土产量或藏量，莫不富甲全国，石油、水力电源，均极丰沛，又因气候雨量适当，农业发达、牧畜鼎盛，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优厚的一个区域，因有“中国的生命线”之称。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处心积虑，发展东北重工业，以做为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基础。战后据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调查的报告，德、日败亡，中国东北在当时继美、苏、英之后，列为世界上第四大工业区。战后东北国际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

东北又因地理位置居于中国边防要冲，绵长的边界与外蒙、苏俄远东部份、及朝鲜半岛毗连，隔海与日本对峙，地缘政治异常复杂。以中俄边界为例，西起满洲里东至图门江口，苏俄在远东地区领土，对我东北形成一大弧形包围圈。赤塔、海兰泡、伯力、海参崴，乃俄国包围东北四大军略据点。以军事观点来说，苏俄领土处于外线，我国东北则处于内线。苏俄军队入侵东北，甚为便捷，抗战末期，日本投降前夕，俄军对日宣战即从各军事据点一齐发动，长驱直入东北，日军穷于应付，数日内即遭击溃。



东北为华北的自然屏障，彼此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中国中原王朝的政府，对于东北（古辽东）的边防问题，莫不投以最大关注。由秦汉至隋唐，经略辽东，一直是中原王朝政府军事、政治、以及外交上的优先考虑。隋唐时期，隋炀帝、唐太宗且先后率大军御驾亲征高丽，可见得中国皇帝对辽东地区新兴民族的威胁，是如何的敏感。十二世纪，女真族兴起于东北的中北部，建立金王朝，一举南下入侵中原而灭北宋，统治中国北部一百多年。有明一代，东北边害，仍旧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明太祖朱元璋甫一开国便遣二十万大军出师东北，征服辽东。可是至十七世纪，女真族的后代再度崛起，乘晚明政府积弱腐败，中原动乱，大举入关，消灭了朱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东北与中原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东北的得失，往往直接关系中原政权的安危。东北新兴民族的军队，一旦破关南下，便是中原汉族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东北资源丰饶，战略位置险要，一旦落于敌对势力之手，便可用来做为侵略中国本土的根据基地。

俄国自十七世纪推行“东进”政策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一直虎视眈眈。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清政府弱点毕露，俄国乃乘机大举鲸吞我东北土地，胁迫清政府订立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广大的土地掠夺而去。自此东北版图残破，俄国势力侵入东亚。同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亦开始了“北进”政策。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日本势力由此进入朝鲜半岛，积极展开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东北此后，便成为了国际势力竞争的角力场。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竟是在中国的领土东北开火的。俄国战败，日本取而代之，遂成为左右东北的主要外国势力。

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东北亦是中国的火药库，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战争、革命都是在东北引爆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爆发，日本占领东北后，便以东北为根据地，向中国发动了八年侵略战争。日本战败，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恰恰又是以东北的争夺战作为序幕展开。这绝非历史巧合，而的确是东北国防战略及天然物质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决定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年来国共双方政府、以及中外学者；检讨国共内战的胜败原因，莫不认为，东北的得失，对国共内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国共两军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则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其前因后果及经过情形，值得详细研究。

文章来源：《父亲的憾恨——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原载于台湾《当代》杂志。

荐书：秦风：《1904-1948 岁月东北》



作者: 秦风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7-1

页数: 236

ISBN: 9787563364206

1904 年，日俄列强全面摊牌，爆发战争，结果日本大获全胜，从帝俄手中夺得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经营权，更欲掌控中国东北。1928 年，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此举不但没有吓倒张学良，反而促成东北易帜，公开抗拒日本对江北的领土野心。随着关东军的军事占领，筹划多时的“满洲国”也粉墨登场，逊帝溥仪成了关东军手中最大的玩偶。为确保占领，日本将本国贫穷的农村人口大量地迁移到中国东北，并对其编织了一套美梦，由思想家、教育家、作家、记者齐声共鸣，将中国东北描绘成任何人都可以力争上游、美梦成真的人间天堂。殖民主义光鲜外表的背后，却是日军持续的侵略以及空前残酷的清乡手段。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屈服，反而越挫越勇，在抗暴斗争中谱成悲壮的民族史诗。1945 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立刻牵动美苏争霸与中国内政的敏感神经，这将决定战后的世界里谁将是真正的老大，以及中国人未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回到目录】【原文链接】

【明清】

魏斐德：皇太极的汉族合作者（节选自《洪业》）



魏斐德，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

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

”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①]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②]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③]

[①]《早期满洲国家》，第 137—138 页。

[②]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 138—139 页。1627 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 2 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 清太宗朝》，第 165 页。

[③]《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 5 页；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39—140、148—149 页。

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①]此 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②]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③]

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 80 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④]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⑤]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 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 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 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

[①]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 18 至 60 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 24—28 页。17 世纪 30 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 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 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 93—94 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 10 页。

[②]《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 10—11 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 18 页；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7 页。

[③]普雷斯顿 M 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 19—20 页；罗伯特 B 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 34 页。1625 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 300 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 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 200 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 88 页。自 1632 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46 页。

[④] 满洲巴克什，1631 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28—130 页。1629 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 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 200 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 7 页；乔舒亚 A 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 19—20 页。

[⑤]劳伦斯 D 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 10 页。

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①]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②]

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 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③]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

1629 年 11 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④]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⑤]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 永平。[⑥]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

[①]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33 页。

[②]皮埃尔 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 19—20 页；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26—128 页。

[③]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 1626 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 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20—121、165—167 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1—2 页。关于 1628 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 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 85—86 页。

[④] “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 ·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 60 页。

[⑤]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 205—216 页。

[⑥]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 98 页。





“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①]

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 年 4 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 5 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 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②]

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 年 7 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 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③]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 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④]

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 7 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 221—225 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 6—7 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572 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 245 页。

[②]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9 页；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21—122 页；《皇清开国方略》，第 234—236 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 98 页。

[③]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40 页；《皇清开国方略》，第 237—241 页。

[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9 页。



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①

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 岁以上 15 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②

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③1633 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 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④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⑤六部（建于 1631 年 8 月 5 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⑥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⑦

---

①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53 页。

②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53 页。

③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 9 页。

④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 55 页。

⑤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592 页。

⑥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 20—21 页。

⑦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 9 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 1/6。每部承政 4 人，2 为满洲，1 为蒙古，1 为汉人；参政 14 人，8 为满洲，4 为蒙古，2 为汉人。1638 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 31—32 页。在 1632 到 1644 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 1636 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31 页。

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①]其实，自1626 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②]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 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 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 14 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③]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 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④]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 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⑤]

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⑥]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 年 2 月 8 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 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 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⑦]

[①]《皇清开国方略》，第 251 页。

[②]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 李：《早期满洲国家》，第 111—112、180—181 页。

[③]佟养性是开元的富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 22 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 1621 年）。佟养性死于 1647 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 53—55 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 20—21 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797 页。

[④]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 21 页；郑天挺：《探微集》，第 55 页。

[⑤]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797—798 页。

[⑥]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 20 页。

[⑦]《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 3—4 页；《皇清开国方略》，第 244 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 797 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



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 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 1626 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①]

本文节选自魏斐德的史学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①]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 261—268、272—282 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

谢承仁：明朝后期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


谢承仁（1924-2013），教授，著名中国史专家。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史。

“

历史记载，早在明以前，就有大批汉人——贫苦的农民、各种手工业工匠，还有一些逃避战乱、寻找世外桃源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东汉末年的管宁、邴原、三国时的太史慈、以及晋朝时的高瞻等，先后来到东北。他们把关内的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封建文化，带给生活在这里的各兄弟民族，这对当时尚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满族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满族的祖先，古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主要分布在祖国的东北地区。明朝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沿岸；建州女真原居住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后来几经迁徙，才移至今辽宁新宾一带；野人女真世代居住在从伯力到庙街的黑龙江两岸。

元朝被明推翻后，明政府肃清了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设置了地方政权机关——“辽东都指挥使司”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的治所在辽阳。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地方，即元代的征东元帅府故址。这两个都司，分别在其管辖的地界内，行使明朝政府的职权，管理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

清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称明初疆域仅“东尽於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明人曾未涉其境。”这种说法，乃满洲贵族讳言其祖先与明服属关系，故意制造烟幕，是不符合事实的。

明永乐七年（1409 年），明政府派遣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由钦差内官亦失哈率同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不久，亦失哈还在该都司治所特林地方江边山上，修建了一座永宁寺（永乐十一年修，后被毁，宣德八年重修），并先后两次立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和修建永宁寺的经过。这两块石碑就是历史的见证。它有力地告诉人们，明初的东北疆域实际已到达什么地方。



历史记载，早在明以前，就有大批汉人——贫苦的农民、各种手工业工匠，还有一些逃避战乱、寻找世外桃源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东汉末年的管宁、邴原、三国时的太史慈、以及晋朝时的高瞻等，先后来到东北。他们把关内的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封建文化，带给生活在这里的各兄弟民族，这对当时尚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满族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据明正统八年（1443 年）四月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指汉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虏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1]又据《辽东志》卷七《艺文·卢琼〈东戍见闻录〉》描述建州女真部的社会经济状况，说：“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指汉人）。”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看出，不论是海西女真部，还是建州女真部，都有不少汉族农民在那里耕作。

朝鲜成宗六年（1475 年）七月癸丑《朝鲜实录》讲，建州女真使用的箭镞，“昔皆用骨，今则皆以铁为之。”铁的来源系建州女真人用貂皮向朝鲜人交换得来。成宗十四年（1483 年）十月庚午《朝鲜实录》又讲，这时建州女真的甲胄，也“以铁为之”，问其“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剌温地面。”又问“有冶工乎”？答曰：“多有之。”[2]如上所述，过去箭镞用骨制，后来用铁制；原来铁的来源靠向外交换，以后能自己生产；起初只能用铁制箭镞，继而还能用铁制甲胄，而且冶工很多。这些事实，反映了建州女真部的一定铁冶水平。尽管记载中没有说明这些冶工是否为汉人，但不难推测，既然女真各部家中有不少汉族农民，那么，这些冶工中很可能有一些就是汉族农民。

据《辽东志》卷六《人物》载，管宁来辽东，“避乱者皆来就之，旬日成邑。”高瞻来辽东时，率领了“数千家”。这种记载当然有夸大成分，而且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传播的肯定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接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也只能是女真各部极少数上层人物；但是，不管怎样，通过这些人，总算把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这块比较后进的地区。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远。从山东登州（今蓬莱县）、莱州（今掖县）坐船，若遇顺风，一昼夜即可抵达辽东旅顺口。辽东地方，棉花、布匹，取给于山东；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居民，亦各有船往来登、辽，贸易度活。[3]明政府先后在开原、广宁、抚顺等地，开设马市。通过开市交易，汉人把铧子、铁锅、米、布、绢、缎、袄子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卖给满人，满人则把马、牛、羊等牲畜和貂皮、人参、松子、木耳、蜂蜜、兽皮等土特产卖给汉人，彼此互通有无，各自满足需要。尤其是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自开为互市场后，汉族和建州女真族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满族社会也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猛哥帖木儿兴起。永乐时，他曾随同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显忠来京师朝贡，受到优渥的接待。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佥事，最后升为右都督。[5]猛哥帖木儿在清史上称“都督孟特穆”，被尊为“肇祖”；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就是他的后裔。

猛哥帖木儿升右都督不久，就被另一支女真人杀害。他死后，他的儿子董山（一作“童山”、“充善”）和他的异父同母弟凡察为争夺建州左卫的卫印，长期相持不让，明政府为解决矛盾，于是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6]升董山为都督同知，掌管左卫；升凡察为都督同知，掌管右卫。

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到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起来。关于努尔哈赤的先祖世系，明史书与清史书有不一致之处。据清史书上记载，自孟特穆往下传：第一代为充善（明作“董山”、“童山”），第二代为锡宝齐篇古，第三代为都督福满（清尊为“兴祖”），第四代为觉昌安（明作“教场”、“叫场”，清尊为“景祖”），第五代为塔克世（明作“他失”、“塔失”，清尊为“显祖”），第六代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清尊为“太祖”）。明史书上记载清太祖先人世系，与此稍有歧异：第二代之锡宝齐篇古和第三代之福满，在明史书中找不到字音与之相对应的人名。特别是第三代，明史书叙述断线，脉络不明，如由努尔哈赤往上数，父亲他失，祖父教场，均与清史记载相同，但再往上数，教场之父是谁？即第三代是谁？不清楚。此处所说之“六世孙”，系依清史记载。

努尔哈赤十五、六岁那年，他的父亲、祖父，都被明边将李成梁所杀，他本人则被李成梁收留帐下抚养。有关努尔哈赤父、祖被杀事，这里有必要作一些史实上的交代：

据《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谓建州都指挥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万历二年十月复大举入犯，李成梁设伏大败之。王杲走南关（明称海西女真哈达部为“南关”），哈达都督王台执以献，王杲被杀。王杲死，其子阿台要报父仇，数次兴兵，亦为李成梁所败，被射死。杲部遂灭。《传》中叙述了王杲、阿台父子被灭的经过，但是没有提到努尔哈赤的父亲他失和祖父教场。

又《姚宫詹文集》卷之一《建夷授官始末》（见《明经世文编》卷五〇一）：“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犯清河、抚顺，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发兵剿之，杀其子阿台等。杲走匿王台所，台执杲使其子虎儿哈送诣军前，将吏献俘论赏。……此万历二年冬也。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叫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已又杀叫场及其子他失。叫场、他失者，奴（努）尔哈赤之祖若父也。时奴（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这段文字明白地记载了李成



梁杀教场、他失及努尔哈赤乞哀的事，补充了《明史·李成梁传》的不足之处。其中所述与《明史》不同之处是：阿台先于其父王杲被杀，当然谈不上为其父报仇的事。

又《熊经略集》卷之一《答友人》（《明经世文编》卷四八〇）：“自宁远（李成梁曾封宁远伯）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诱彼间此，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而是时，奴酋之祖曰教场，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婿也。其袭阿台也，宁远实使诱之。已而城下，并杀其父、祖。而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敕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且请为龙虎将军以宠之。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各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教场、他失和王杲、阿台有亲戚关系，所以李成梁才叫他失、教场去诱降，搞里应外合；等到事情成功后，李成梁又反过来杀掉了他失和教场。《明史·李成梁传》之所以不提他失、教场两人之名，无非是清修《明史》时执笔者替清统治者掩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失、教场之被杀，是李成梁玩弄“诱此间彼，诱彼间此”的一贯手法，是有计划的，绝不像有些史书所说，他们是在乱兵之中被误杀的。

努尔哈赤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对明军将官的强弱和边防的虚实了解比较清楚。万历十六年(1588)，他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次年，明朝政府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又加封他为龙虎将军。

女真各部首领，一向接受明政府的官职，服从约束和调遣。明政府分别发给各部“敕书”，诸部首领每年按期率领部属持敕书由指定关口，进京朝贡。这已成为定制。其制如下：

女真各部进京朝贡，除野人女真因离京师太远，未作硬性规定外，对海西、建州女真则有严格规定。明政府发给海西女真敕书一千道，发给建州女真敕书五百道，每年入贡京师一次。入贡人数，海西限定一千人，建州限定五百人（即一人持一敕书）；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海西以开原城东南六十里之广顺关为出入之关口，建州以抚顺所东三十里之抚顺关为出入之关口（抚顺未开关前，验入关口与海西同）。如当年十月未能赶到，至次年正月以后到者，须经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7]

当努尔哈赤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对明政府的态度还算恭顺；但等到他“地大兵强，畜繁马壮”，手下有精兵“三万有奇”的时候，态度就变了，数年不贡，或逾期补贡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8]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地区建立国家，即大汗位，国名“大金”（又称“后金”），年号“天命”，以这年为天命元年。从这时起，金和明就成了不容并存的两个对立政权，爆发了一连串的战争。

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1618 年），努尔哈赤借口报父、祖被杀之仇，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兴兵攻明。所谓“七大恨”，各书所记颇有出入，今以金梁辑《满洲秘档》（原名《满洲老档秘录》）中《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录如下：“如癸未年，尔国无故兴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与蒙古会兵侵我，天以我为是，以彼为非，彼时尔明并未援我；后哈达复来侵我，尔明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兵伐哈达，天以哈达畀我，尔明乃庇护哈达，逼我复还其人民；我既释还哈达之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乃于我国则不救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偏私至此，二也。尔明虽屡启衅，即至害我二祖，我犹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界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两国之人，毋越疆圉，违者殛之。乃癸丑年，尔国以卫助叶赫，发兵出边，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殃必及之。后尔国之人，潜出边境，扰我疆域，我遵前誓杀之，尔乃谓我擅杀，缧系我使臣纲古里、方吉纳，又索我十人杀之边境，以逞报复，四也。尔以兵卫助叶赫，使我国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尔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之庐舍，扰我人民之耕耨，不令收获；且移置界碑于沿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其间人参、貂皮、五谷、财用皆产焉，我人赖此以为生活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胜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明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各地兵八万八千余人，分兵四路，打算一举消灭后金。努尔哈赤侦知明军进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办法，沉着应战。他先集中兵力设伏于抚顺东南之萨尔浒山，击破西路明军；随即分兵击破北路明军；然后急回师兴京（即赫图阿拉），迎击前来捣后的东南路明军。明军三路兵败，惟南路李如柏军因早闻西、北两路败讯，未敢冒进，惶急撤退，得以保全。这就是金、明之间有名的萨尔浒战役。通过这次战役，努尔哈赤乘胜攻取了开原和铁岭。从此，后金在东北的势力大大的巩固，明在东北的统治力量大大的动摇。努尔哈赤的兵力“已近十万”。[9]明对后金不得不被迫处于守势地位。

为了挽回了辽东败局影响，明政府将杨镐逮捕下狱治罪，改命熊廷弼为经略，在军事上重新布署。熊廷弼到任一年多，被其他官僚排挤去。继任者袁应泰不善用兵，防务松弛。努尔哈赤先后进攻沈阳、辽阳，二城均在蒙古降兵内应下失守，袁应泰兵败自杀死。辽河以东大小数十余城尽为后金所有。后金从兴京迁都辽阳，继而又迁都沈阳。

沈、辽兵败，明朝廷极为震惊。熊廷弼再次被起用为经略，王化贞被任命为巡抚，前往辽东，收拾残局。熊廷弼主守，提出了明确具体的防卫计划；王化贞大言主战，军事上却无所准备。经略、巡抚不和，明军力量自行削弱。

明天启二年（1622 年），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率兵渡辽河，王化贞弃广宁（今辽宁北镇）而逃，广宁守军十三万，一触尽溃；熊廷弼驻军右屯，距广宁四十里，只有士兵五千，无法救广宁。熊廷弼率领五千人在大陵河与王化贞败军会合，一同退入山海关。

广宁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加剧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这时，正当宦官集团当政。魏忠贤要报杨涟疏劾“二十四大罪状”之仇，想借广宁兵败、失陷封疆为题目，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熊廷弼为宦党所攻，被杀，传首“九边”。[10]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被诬以受熊廷弼贿，下诏狱，拷掠至死。

天启六年（1626 年），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遇到宁远守将袁崇焕的坚强抵抗。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从天聪元年（1627 年）起，建州女真改称“满洲”，不再使用“建州女真”这个名称了。

“天启”只有七年。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即位。这时，陕、甘地区农民起义已经爆发。明政府感到东、西两面同时用后，力量不足，为了先平息内乱，在崇祯皇帝默许下，兵部授意袁崇焕暗中与金接触，试探和议。崇祯二年（1629 年），金天聪三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暗中进行的和议谈判破裂。皇太极致书明大臣，把“不肯息兵”的责任全推给明。[11]接着，金兵大举攻明：冬十月戊寅（二十七日），攻入大安口，破遵化、三屯营，越蓟州（今河北蓟县）而西，十一月十九日（1630 年 1 月 2 日）直迫北京广渠门外。[12]袁崇焕千里赴救，以九千骑由闻道入援京师，结营广渠门外，与金兵鏖战。皇太极环阅北京城，命投降太监某某入城劝降。后金行使反间计，散布流言，说金与袁崇焕之间有密约，袁引金兵入内，将胁迫明朝皇帝为城下之盟。崇祯皇帝朱由检中计，将袁崇焕逮捕刑讯，以谋叛罪论死，活剐于市。[13]。

后金统治者为进一步对明作战，用武力压服了蒙古，撤除了明的屏藩；另外，加紧整顿内部，强化专制统治。皇太极下令仿照明朝的封建政治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命令满、汉、蒙官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均须学习汉文书籍，不许姑息容隐，否则其父兄不许披甲随征[14]；随后，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金统治者还采用各种办法大量招降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

明崇祯九年（1636 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上皇帝尊号时，特意以满、蒙、汉官的代表分别捧着满、蒙、汉文表章劝进，表示清的皇帝是受各族拥戴的共主，借以加强其覆灭明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号召力量。

以后，清兵不断大举深入明内地，俘虏大量人口，给明统治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清崇德元年（1636 年），阿济格率清兵越独石口，入居庸关，过昌平，逼北京，过保定，

共俘虏人畜十九万五千零五十[15]；崇德三年（1638 年），多尔衮、岳託分兵两路，深入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方州县，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一说“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16]；崇德七年（1642 年），阿巴泰领兵进入长城内，“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7]

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一切战争，都是与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不可分的。没有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不含有政治目的的战争。既然如此，那么，明与金（清）之间一系列的战争，是在怎样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展开的？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又有甚么关系？

历史告诉我们，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金建立之后，努尔哈赤时期，女真族的奴隶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金改国号为清后，皇太极时期，满族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18]而这个时候的明朝，已走向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金（清）和明相比，要富有生气得多；金（清）统治者也不像明统治者那样暮气沉沉、昏庸腐朽。但是，这两个政权，不论是金（清）也罢，还是明也罢，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专政机器。明与金（清）的矛盾和战争，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并非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明政府处理国内兄弟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最初造成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纷争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始至终，明政府对待建州女真的政策是：

以利禄作为笼络手段，分别授给女真各部头目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并开关设市，许其“朝贡”贸易。这样，就使得女真各部首领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又不得不依赖明朝；在政治上向明表示臣服，回头又凭借明的势力奴役、剥削本族人民。明统治者通过这些办法，“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19]从而达到所谓的“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20]的可鄙目的。在这种政策思想指导下，明朝皇室贪婪地向女真各部榨取大量貂、猞猁狲等珍贵皮毛和马匹；甚至还经常派遣内官率领庞大的采捕军，直接到女真族人民居住地区，捕捉海东青[21]、土豹（即猞猁狲）等猛禽、珍兽，供宫廷玩乐、享用，因而激起女真族人民普遍仇恨。明朝的官吏、商人，也常假借互市为名，欺压女真人，对他们敲榨勒索，巧取豪夺。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禁绝建州女真互市，使他们准备出售与明的特产——人参，两年内腐烂达十余万斤。巡按都御史郭光复派遣辽阳材官萧伯芝，责问努尔哈赤为何不向明廷进贡蜂蜜；萧伯芝冒充天使，蟒衣玉带，装腔作势，态度傲慢，使得努尔哈赤恨之入骨。以上事例，不成问题，曲均在明。女真统治者就往往借此为理由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造成明与金（清）关系紧张的原因，明统治者有责任，女真统治者也有责任。尤其是后金的力量强大后更是如此。事情绝不完全像努尔哈赤所说，由于明对女真“苦害侵凌，千态莫状”，[22]金才以“七大恨”告天攻明。这里仅举一例，即可揭穿其谎言。努尔哈赤兴兵不久，明统治者派人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农民，努尔哈赤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派兵到会安堡也杀死一些明的农民，并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杀死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2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此刻的态度是相当强横的。所谓“七大恨”，说穿了，只不过是女真贵族发动战争所散布的烟幕而已。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早就对明存有觊觎之心。把族名“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国名“金”改称为“清”，实际就已经公开暴露了女真贵族兴师打仗的真正意图。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族名“建州女真”为“满洲”，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建州”为明设置之卫所名称，“女真”为一种族名称；皇太极统治时期，在其统治地区内，不仅有女真人，而且还有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若仍继续使用“建州女真”一名，一则怕“女真”二字会引起汉人对历史上宋、金对峙关系的痛苦回忆，再则怕“建州”二字会引起蒙古人、朝鲜人对金、明臣属关系的联想而产生轻视心理，故在女真贵族看来，非改族名不可。另外，从积极方面讲，“满洲”，系“曼殊”、“文殊”、“满珠”之音转。“曼殊”，汉语为“妙吉祥”的意思，是当时西藏、蒙古、女真、朝鲜等族人民都很熟悉的一种尊号，改“建州女真”为“满洲”，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女真贵族为了争夺天下、加强和各族的关系从政治上来考虑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国名“金”为“清”，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与改族名之消极用意相同，数百年前，宋、金对立的历史，犹在汉人记忆中，改“金”为“清”，可以缓和其统治区内汉人思想上的对立情绪。另外，从积极方面讲，“金”是袭用前代称号，不合开国气象。再者，“金”国名称之由来，乃起源于古地名金源，带有偏于一隅的地方色彩，若作为一个代表全国性政权的国号而言，显然很不合适。“金”、“清”二字读音相近，改“金”为“清”，容易使其统治区内人民接受，而且“清”字含有“廓清”、“扫清”之意义，此点正好符合女真贵族兴兵灭明、统一天下的思想。[24]

当明与金（清）的关系发展到作为两个政权对立的阶段时，其矛盾的性质业已改变，已不再是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策当与不当的问题，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谁消灭谁的问题；不论是明，还是金（清），都各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都不能代表广大人民，因此这两个

政权的斗争，是非曲直难以用一般标准衡量，通常是：胜者为是，败者为非；胜者一切有理，败者全盘皆错。

金（清）为了对明作战，对其统治下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据《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十一讲，当时辽阳、沈阳地区的农民，“一年所收之谷，尽入于八高山（八旗）之家，贫不能自食。”又据王氏《东华录》“天聪”卷一及《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讲，知在金（清）统治下，人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仅在清崇德元年（1636 年）一年里，在通往明和朝鲜的几个河口关隘上，就截住了逃亡者一千多人，其未被截获者当然还不少。

当女真贵族更改族名、国名的时候，在明统治区内，正是农民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明统治者一方面要对金（清）作战，一方面要全力镇压农民军，在军费开支上，有对金（清）作战的所谓“辽饷”、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所谓“剿饷”和“练饷”，“三饷”的加派，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一度，明与女真贵族之间曾有过暗中勾结、密谋和议之事。天启时，袁崇焕和皇太极曾有信使往来，秘密议和。崇祯时，朱由检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清贵族暗中接洽，进行和谈，“手诏往返者数十”，后因密谋泄露，引起朝臣议论，反杀陈新甲以掩饰。[25]

在金（清）统治者和农民军两面夹攻之下，明统治者深感招架困难，力不从心，处境十分狼狈。一位曾经目睹明末局势变化的学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录》一书中这样说：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农民军；农民战争紧急，则调边兵征剿农民军；清军紧急，又撤征剿农民军之兵以御清军。终至清军、农民军、官军三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26]

起初，明统治集团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两大势力威逼之下，曾对当前形势作过轻重缓急的分析，主张先专心剿灭农民军，然后再养全力以制清。兵部为此上奏皇帝，疏陈方策，说：“一曰‘灭奴’（指对付清统治者，下同），先‘灭寇’（指对付农民军，下同）。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臣以为寇非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心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说，不难看出，不管明军与金（清）八骑兵之间斗争如何激烈，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满、汉整个民族之间进行，而只是在汉族统治者与在政治上被排挤的满族统治者之间进行。

明末农民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金（清）统治者在山海关外节节取得胜利之时，也正是山海关内农民革命如疾风暴雨迅速发展之时。金（清）对明的战争，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耗损了明统治者一部分财力、物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反过来，农民军在关内一次一次给明统治者沉重打击，客观上也为

金（清）的发展带来了可趁之机。清入关之前，虽然没有直接和农民军发生冲突，但潜在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旦两军在山海关前相遇，满洲贵族所暴露出来的狰狞面孔和残酷手段，与明统治者相比，丝毫没有甚么两样。

本文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 年第 2 期，中华文史网网络首发。

注释：

[1]见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五、第三十九页。

[2]以上所引，见《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十、第二十九页，及卷十一、第四十九页。

[3]《辽东志》卷七，《艺文·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会陈边务疏》。

[4]《满洲实录》卷二；“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谓建州右卫设于永乐十年（1412 年），但“建州左卫”这个名称开始见于《明实录》则在永乐十四年（1416 年）二月壬午。猛哥帖木儿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在宣德元年（1426 年），升为右都督（正一品）为宣德八年（1433 年）。

[6]分设建州右卫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 年）。

[7]以上规定，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并参看《辽东志》卷二《建置》。

[8]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9]《明经世文编》卷四八〇，第五二八二页。

[10]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事在天启五年（1625 年）；王化贞直到熊廷弼被杀后七年，始论罪伏诛。

[11]《满洲秘档》，《太宗再致明国大臣书》。

[12]金兵入大安口日期，见《明史》卷二十三；直迫北京广渠门日期，见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

[13]袁崇焕被杀，《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谓在崇祯三年四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谓在崇祯三年八月。

[14]《满洲秘档》，《太宗谕金、汉、蒙官子弟读书》。

[15]《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七月辛酉载，俘获人畜共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同书，卷三十一，崇德元年九月乙卯载，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此处所说俘获人畜数，系指崇德元年七、九两月而言。

[16]同上书，卷四十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17]同上书，卷六十四。

[18]参阅 1962 年第六期《历史研究》，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明清史》、《中国史纲要》等书之有关部分。

[19]《皇明经济文录》卷三十四，《蓟州编·女直考》。

[20]《明经世文编》卷四八〇，五二八七页。

[21]海东青是一种能捕天鹅的猛禽。《元史·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下注云："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云："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元朝宫里赏钞五十锭。"

[22]《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23]《太祖武皇帝实录》二，一十四页。

[24]以上说法，参看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十八章及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一文，并加以己意写成。

[25]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有关袁崇焕与金国汗往来之书信，以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26]夏允彝《幸存录》卷之一《东夷大略》（我所见到的《幸存录》，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有两种，一种无卷次，一种有卷次，两种钞本个别文字有出入）："我之兵力，每以御（一作"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又撤（一作"辍"）剿寇之兵以御虏。卒之三（一作"二"，"二"指寇、虏，"三"指寇、虏、兵）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2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崇祯九年《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作者: 魏斐德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副标题: 清朝开国史

原作名: The great enterprise

译者: 陈苏镇 / 薄小莹

出版年: 2013-8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它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中日】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


杨天石，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事变”初起，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小事化了”，但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事变”初起，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小事化了”，但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1931 年 9 月 18 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 9 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1931 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 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 4 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 10 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 月 19 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 年版，第 1 页)。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 日，“戌”，约 21 点至 22 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 9 月 19 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东北日报》1946 年 8 月 24 日。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 1934 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 9 月 18 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 9 月 19 日上午 8 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 19 日发表通电，中云：副司令行营效日（19 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

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 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 9 月 18 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 262 页）。“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 年 8 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 NHK 采访组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5 页）。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

9 月 19 日下午 2 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1931 年 9 月 21 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

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 月 19 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 月 22 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7 页）。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 月 23 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 年印行，第 13-15 页。）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 月 21 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 556 页。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 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 1932 年 1 月 2 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 6 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 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 2002 年版，第 127-128 页）。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 3 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 年 6 月 15 日）。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本文节选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王海晨、杨晓虹：张学良口述的几个历史事实

王海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杨晓红，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

在民国人物研究中，相比较而言，有关张学良的研究论著颇丰。面对众多围绕他而写的论著、史料，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

在民国人物研究中，相比较而言，有关张学良的研究论著颇丰。面对众多围绕他而写的论著、史料，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他何以发笑？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 80 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评语”就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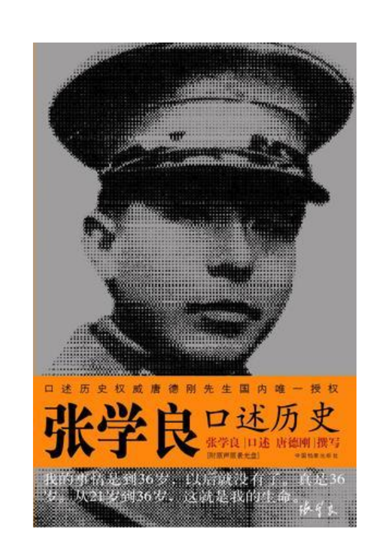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 《百年潮》杂志（2010 年第 10 期）。

因版权问题，完整版请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51335377.html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作者: 张学良 口述/ 唐德刚 撰写

出版社: 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年: 2007-7

ISBN: 9787801668431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在张氏印象里，张作霖吃饭，四菜没汤；张作相节俭，一个鸡蛋分两餐；叶公超好色，顾维钧风流；蒋介石只剩下了个派头；汪精卫、陈璧君的奇妙夫妻档；胡汉民发牢骚；孙中山一句话论东北局势；郭松龄宁折不弯，吴佩孚浪得虚名；阎锡山见风使舵、张宗昌能战、孙传芳不甘寂寞；以及溥仪溥杰，没落的皇室家族的种种……张氏的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好比在历史的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是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程映虹：周恩来为什么不忘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今天，日俄战争却似乎被遗忘了。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年是甲午战争 120 周年，但也是日俄战争 110 周年。前者是日本一家侵华，后者是日俄为了东亚霸权大打出手，把中国东北作为战场，而中国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把国土让给日俄作为战场，其民族耻辱远胜甲午战争。那场战争的结局是俄国战败，将中国东北的殖民霸权让给日本。沙俄帝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耻辱，直到 1945 年通过在最后一刻加入对日战争才报了一箭之仇，通过另一个不平等条约夺回了 40 年前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

所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今天，日俄战争却似乎被遗忘了。

我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不纪念日俄战争？》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苏联在旅顺建日俄战争纪念碑》（秦九凤文，载《党史博览》2011 年第三期），它用详细的史料对日俄战争对周恩来的影响，以及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对相关问题的态度做了梳理，很值得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重温。

中国人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要改造国民性，一定程度上是深受日俄战争的刺激。但很少有人知道，日俄战争对少年周恩来也有强烈的刺激。周当年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有一年没有回家度假，和一个姓何的同学去了他在奉天南郊的老家。何家的祖父是一个民族主义情怀强烈的老秀才，在家开私塾。他带着周和自己的孙辈去看奉天附近日俄战争的旧址。日俄战争从旅顺打到奉天，沙俄战败，把一腔怒气发泄到中国人头上，滥杀中国无辜百姓，何家就被俄军杀了四个，伤了六个。

当周恩来看到矗立在魏家楼子沙河岸上的纪念碑纪念塔时非常愤怒，说：“张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们李家，杀了我们李家无辜的人不算，还要在我们李家竖碑立塔纪念，真是欺人太甚了！”他还唱起了当时在东北十分流行的歌曲《何日醒》：“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吾党何日醒？”

日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一直延续了下来。1955 年苏联和中国商谈从旅顺撤军时，苏联提出要在旅顺建立纪念 1945 年苏军胜利纪念碑和苏军烈士墓地，

还要建立日俄战争时在那里战死的俄军马卡洛夫中将纪念碑和其他阵亡者的方尖碑。旅顺两万多俄军/苏军尸骸中，绝大部分是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的冤魂。周恩来同意了前两条，但拒绝了后两条。以当时中苏关系的亲密程度，周恩来的拒绝还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对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耻辱的不能忘怀，还表现在他对苏联小说《旅顺口》的态度上。1950 年 1 月，周赴苏谈判，由于火车要走 10 天，他关照秘书带一些阅读材料。秘书带了这本 1946 年出版后得到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周恩来翻了一半就对秘书说这是一本坏书，作者站在沙皇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竭力美化和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他还说：“这样一本书，竟然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回程中，周恩来再度对这本书发表评论，说它“宣扬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实在令人气愤”。

1956 年周恩来听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苏联话剧《在那一边》，反映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历史，他当即询问导演，剧中是怎样表现中国人的，导演说剧中没有正面表现中国人。周非常不悦，说写发生在中国的事怎么能没有中国人，他又再次提到《旅顺口》这本小说，问导演有没有读过。周告诉他们那是一本坏书，光写中国人的愚昧。

当时“一边倒”是既定国策，这本小说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也不奇怪，周恩来作为领导人之一当然了解底细。天我们知道但今他私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愤懑，尤其是在前往苏联和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时，还一直念念不忘，至少可以说当年日俄战争的刺激还是给他处理中苏关系有一些影响。他对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民族耻辱和后来苏联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所持的一贯立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有所启发。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齐邦媛：《巨流河》



作者: 齐邦媛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0-10

ISBN: 9787108034731

巨流河，在清代被称为巨流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故事。那立志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父亲，在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六十年来，作者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却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抗战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卫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逢生的盼望；在四川、在滇缅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作者心中仍墨迹未干……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国共】

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节选）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

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

编者的话：当二战进入尾声，苏联红军突然向关东军发动进攻，从而夺取了对东北的控制权。然而，苏联的目标却不仅仅是单纯的“反法西斯”。斯大林的首要目标，是继承沙皇俄国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苏联似乎应该全力支持中共武装掌控东北。可是碍于本国在东北的利益诉求和得罪美国的风险，苏联又不得不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反复权衡，时而支持中共，时而延缓其掌握东北的进度。从苏联红军攻入东北到国共在东北爆发大规模冲突，苏联的政策经历了哪些转折？本文摘自沈志华老师的《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旨在向读者解密苏联和中共围绕东北的战略考量。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 1941 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 年 6 月，第 11-12 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



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 4-5 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 6 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 月 9 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 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 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 8 月 14 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



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 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 月 20 或 21 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 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 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



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

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 月 25 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8 月 30 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

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

9 月 6 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 5 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得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

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 5 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10 月 10 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

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 3 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 86 种、总数超过 470 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 4 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 9000 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 8 月份就举办了大约 200 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 160 场。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 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 年 7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 88 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便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 月 11 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 88 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 月 6-9 日，第 88 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 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

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第 115～131 页。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节选）



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这种帮助和援助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它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编者的话：在不少人眼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共自力更生的结果。史料表明，至少在东北战场，苏联对中共的各方面援助是相当可观的。由于这些援助的到来，解放军在某些战斗中展现出的武力丝毫不在“武装到牙齿”的国军之下，而“小米加步枪”的形容显然无法反映完整的情况。对于苏联援助对中共的数量与意义，学界还发生过争论。本文节选自历史学者杨奎松对刘统观点的反驳，力图勾勒出苏联援助的规模和重要性。

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 年第 4 期）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他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

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作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考察苏联这段时间的军事援助情况，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 1946 年中到 1947 年中自身的武器增长的两个数字，就来判断苏方资料提供的数据可信与否。关于此点，笔者在《恩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



一是 1945 年 9 月 21 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容。该电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21 日）。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

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1945 年 9—10 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第 101、126 页）。

三是 1946 年 5 月 20 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 月 28 日，第一批 82 挺轻机枪、32 挺重机枪、43 万发子弹和 1 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 6 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 8 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 1946 年底 1947 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 1946 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 10 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也不尽然。

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一年时间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苏方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和大量弹药等，有相当部分并不是直接给东北野战军的，而是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 1945 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作论据，也不能只计算 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4 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

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 1200 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 12 万支枪的事实。1945 年 12 月 30 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 120 万发、手榴弹 15 万个等。另外由北面



还运去 12 万支步枪和 300 挺机枪。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 1945 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

况且，只举出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 1945 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 12 月 30 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 40 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 80 万发，手榴弹 15 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 40 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 1945 年 9 月 21 日至 12 月 30 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

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 12 月 30 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苏军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情况，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如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 1200 支，轻重机枪 44 挺，山炮 10 门，野炮 4 门。其中野炮一项在彭真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就不存在。

很明显，仅仅依据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 1945 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 1945 年 9 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 1945 年 9 月下旬至苏军总部离沈，即至 11 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 年 9 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 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 2 万支，轻重机枪 1000 挺和 156 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 10 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 500 万发子弹、炮弹”（《曾克林将军自述》，第 101、126 页）。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彭真 9 月 21 日电已说明接收到 27 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 70 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

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 40 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将军自述》，第 126—132 页）。

与此同时，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联周保中部，接收了日本长春的军火库一部，在苏军同意下也运出了步枪 5 万余支，轻机枪 2000 多挺，重机枪 800 余挺，掷弹筒 500 余个，迫击炮 20 余门，山炮 5 门，弹药 1200 余万发。

驻守锦州的周家美部，也在苏军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武装和搬运军火库，获得火炮近 80 门，轻重机枪 690 余挺，步枪 13200 余支，手枪 350 余支，炮弹 100 余箱，子弹 1000 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44 页）。

连同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所得到的武器数量，仅 1945 年 8—9 月间中共武装早期进入东北者得到步枪数量就已有近 10 万之数，机枪近 5000 挺，各种炮至少有二三百门了。也因此，曾克林一部原仅 4000 人，一举就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经过苏军在东北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那么，彭真等到沈阳后是否真像刘文所举 9 月 21 日电报那样，没有得到多少武器呢？显然也不是。刘文只举了符合其“少得可怜”的看法的 9 月 21 日一封电报。其实，就在一周后，即 9 月 30 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 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10 月 3 日，在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彭真对整个情况的估计更加乐观。次日他即以东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10 月 4 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10 月 5 日，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 130—131 页）

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用不了。即便如此，中共进入东北的武装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 3 万支，机枪 100 挺，大炮 15 门。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 30 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 年 10 月 4 日、8 日）。

10 月 25 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除已搬走者外，苏军都愿交给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 300 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 年 10 月 25 日）。

在此期间，中共东北武装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未出发，或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能派兵暂时看管起来。以至于因 11 月 17 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这才有了黄克诚部急急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和抱怨。但即便如此，在苏军态度转变前，东北武装也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枪炮。东北局 11 月 5 日、6 日再报中央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 1　2 万支步枪和 300 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 11 万支，机枪约 4000 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 6 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 2　4 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 年 11 月 5 日、6 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 年 11 月 7 日）。这一情况也可从毛泽东 11 月 12 日报告中看到。他讲到：东北局去后，“枪接受了 12 万支，还有些炮”（毛泽东：《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的方针》，1945 年 11 月 12 日）。

11 月 17 日以后，中共军队虽被迫退出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便于苏方应付外交，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变。经过苏军同意，东北局还是组织抢运出一批装备，连同在中小城市所得武器，故陈云、高岗在 11 月 29 日即电告中共中央称：又得“枪 10 万，炮 300”（《陈云、高岗致中央电》，194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7 日，东北局再告中央：又从旅顺和朝鲜得“近万步枪，百挺机枪”，苏方还提供了 40 余架飞机，东北局已决定成立航空学校（《东北局关于建立空军问题致中央电》，1945 年 12 月 17 日，《彭真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10、312—313 页）。

由上可知，自 9 月下旬中共东北局赴东北后，所得武器数量也很可观。至少取得步枪十四五万，机枪 5000 挺左右，炮数百门。东北局 1945 年 10 初、11 月上旬和 11 月下旬三次报告大批获得武器数，可能有重复计算，故这里只做最保守的统计。

由于 1946 年初苏方与国民党方面的经济合作谈判失败，自 2 月下旬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要求中共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明确表示可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再向国民政府办交代。正是苏军这个时候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态度，





不仅使中共再度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而且根本上促成毛泽东作出了“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国共战后第一场大战，即东北四平、本溪之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打响的（《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153 页；并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100 页）。

试想，如果没有苏军及时的装备和大量弹药的援助，在刚刚马不停蹄赶到关外来、不少部队赤手空拳、东北的军工生产还没有组建起来的情况下，中共如何能够一下子组成 30 万“民主联军”，而且马上和全副美式装备并有空中支援和大量火炮的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展开这样一场需要强大火力和充足弹药供给的大规模现代战争？正是因为有苏军的帮助，中共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成功阻截国民党军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

到 1945 年底，中共军队出关兵力仅 10 万人左右，且相当部分枪支很少，甚至赤手空拳，它如何能够在两三个月里就成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呢？对此，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刘文所举 1945 年底与 1946 年 5 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因为从中多少能够看出，中共在四平之战前大概得到了多少武器。

刘文引述的数据告诉我们，1945 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 39641 支，轻机枪 1139 挺，重机枪 105 支，掷弹筒 59 支，迫击炮 64 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刘文列举之数字，似不包括曾克林等先期出关部队取得的武器在内）。1946 年 5 月部队四平作战结束后，部队拥有长枪 160881 支，轻机枪 4033 挺，重机枪 749 挺，各种炮 556 门。刘文在这里遗漏了掷弹筒 998 支。

两相对照，出关后各部队得到的步枪数至少超过 12 万支，得到的轻重机枪数至少超过 3500 余挺，得到的掷弹筒数至少近千支，同时还至少得到各种炮 492 门。

这里所以要强调“至少”，是因为我们在比较这两组数字时，不能忽略四平作战这一重要背景。要知道，刘文所举 1946 年 5 月的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这一数字中显然缺少了中共在战争中损失的武器装备的数字。此次作战损失究竟有多大呢？由于当时部队来源和扩充情况较为混乱，因此未见武器损失情况的统计，但已知人员损失就近 2 万人关于部队损失数，东北局 5 月 26 日电称伤亡近 2 万人。黄克诚 5 月 24 日电称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 1　5 万人，但加上南满本溪之战，伤亡数理应接近东北局之数（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99 页），大批新扩充



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关于东北军事状况向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报告》，1947 年 4 月，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 385 页），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紧张，北撤途中又遭受追击，结果是“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罗荣桓：《对东北解放战争形势与任务的分析和部队思想工作》，《辽沈决战》（上），第 39 页）。武器装备的损失约略估算为三分之一上下，当不为过。

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 34 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 20 万支，有轻重机枪近 7000 挺，各种炮 700 余门。而且，照 2 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3 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 年 3 月 16 日）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中央关于苏军撤退前力争占领长春致东北局电》，1946 年 3 月 25 日）。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高岗 4 月 20 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 25 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 年 4 月 20 日）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 年 9 月发展到 48 万人，12 月更猛增到 73 万人（《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7 年 9 月 18 日，转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年，第 496 页）。1948 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 105 万人，编成了 12 个纵队，14 个独立师，3 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413—414 页）。部队人数猛增，1947 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 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1947 年至 1948 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除刘文介绍的情况外，有关 1947—1948 年间中共东北军工生产主要还是修复枪炮和制造弹药，不能大量制造火炮的情况，还可参见《黑龙江军事志》第七篇，及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史料》等）。直

到 1949 年春已建成的中共全国 160 家兵工厂月产山炮也只有两三门，野炮不过 4 门，步兵炮只有 7 门，小炮略多约 500 余门（参见程刚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兵工生产概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 年 02 期），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一期（收入本书时略有补充）。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白先勇论国民党东北战败：用人不当未收容伪军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才，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 “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随着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在陈诚任内，1947 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陈诚下台。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有这样的结论:“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

设计：池春荣，季文仪

校订：林心怡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2014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让对话成为可能」。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cochinaforum）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版权声明：一五一十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